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

白利军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本文试图梳理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逻辑进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经历了揭露外在支配和压迫以培养大众的主体精神形成反抗的声浪、解放的行动的“激发主体性觉醒”阶段;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奠定政治、经济、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保有公共领域、遵循主体间性原则以语言为中介展开不同层面的交往商谈行为、以共识作为行动的前提来保障社会的正义的“争取主体间性社会环境”阶段;直接捍卫社会中受到歧视、压迫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强调承认他者”三大阶段。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逻辑进路

中国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2)05-0015-03

对一种理论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的总体性研究、中观的学派研究和微观的学者个人思想研究三个层面,宏观、中观研究通过把握理论深层特质推进对理论的微观研究。本文意在从中观上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历程折射出的逻辑进路展开探讨。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划分标准,批判理论自从1930年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以来,形成了以霍克海默、哈贝马斯、霍耐特为首的三代批判理论家。即使按照承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当代美国批判理论界对批判理论家的代际划分,也可以把批判理论家划分为三代。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的理论异中有同,同一代际理论家的理论有鲜明的主题,不同代际理论家的论题也有一定的交集。总体来讲,他们的批判理论主题经历了从“激发主体性觉醒”到“争取主体间性社会环境”再到“强调承认他者”三大阶段。

一、激发主体性觉醒阶段

1930年代初,启蒙开辟出了现代科技与文化,然而现代科技和文化在工具理性的指引下被运用,结果是人民群众日益被金钱和权力客体化、主体精神日益削弱;从现实来看,德国社会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民众生活恶化、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纳

粹团结了大批不明就里的人民群众迅速发展,传统垄断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和纳粹势力的斗争日益白热化等不稳定的社会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弗罗姆等把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上层建筑上。“他们虽然没有一个社会变革的特定纲领,但整个地热烈赞同无产阶级的事业,并坚定地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们相信,他们的工作有助于阐明社会中起‘反动’作用的对抗力量,从而提高被剥削(阶级)者的觉悟,并为他们提供解放斗争的武器。”^{[1](P28)}换言之,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在努力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掩盖的种种支配和压迫,借此激发无产阶级对自身存在状况的全面认知并最终引导出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来。激发无产阶级主体性的主要方面有:引导无产阶级反思自己思维方式的单面性、价值观的功利化,揭示资本主义科技与文化的欺骗性,批判外在支配对主体性的压抑。

要有实证精神,也要有批判精神。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区分了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别。他认为传统的理论是秉承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原则建立的一个完整而封闭的科学命题体系,其中一些命题是基本命题,其他命题可以从基本命题中派生出来,理论的真正有效性就在于派生命题是否符合实际。依照传统理论的观点“科学之真正的社会功能并未得以阐明;它不谈理论在人

收稿日期:2012-02-17

作者简介:白利军(1971-),宁夏银川人,西安外国语大学思政部讲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

类生活中意味着什么,而只谈论在由于历史的原因它在其中产生的孤立领域里意味着什么。但实际上,社会生活是在生产部门中所进行的所有工作的结果。”

[2] 批判理论则启发人们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察理论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这样既坚持实证主义精神,又充分运动理性进行批判性思考才能看清楚理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揭示了人的本质需求是追求物之外崇高的东西,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广告等意识形态工具把对物的消费需求强化到人的心灵深处,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对消费的需求和社会个体对消费的需求合一,使个体在满足个人的物欲过程中顺从,对社会只有肯定,从而泯灭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最终社会个体成为被物役的生产工具而不自觉。所以,人们不仅需要实证精神,还需要批判精神。

要有工具理性,也要有价值理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阐述了技术原本是服务于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然而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自然和人、社会与个人形成了异化。科技应用于自然,破坏生态环境导致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科技服务于社会进步导致人体成为了机器的延伸。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了技术理性的统治是通过技术与政治的结合而实现的,现代技术理性和传统政治方式的结合造就了现代社会中的集权主义统治力量,使人陷入了新的异化中。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有用工具理性展开对自然和社会的物质性改造,还需要用真、善、美、和谐这些价值指引人们为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人本身而实践。

大众文化具有欺骗性和操纵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概念,批判了大众文化产品是以资本家牟利为目标,为了节约成本按照工业化法则生产、为了吸引最广大的受众内容既不深刻也不低俗,从而使大众文化标准齐一、平面化无深度,丧失了文化应有的涵养、启发大众的功能,这种文化不是植根大众的、而是被给予大众的商业文化;同时大众文化无深度、欠启发力的特质也可以服务于统治阶级欺骗大众、操控大众、构建意识形态等政治统治活动。[3]本雅明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批判了工业化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复制不了原作的灵韵,灵韵消失的复制艺术品丧失了与阅听人进行精神灵魂交流的可能性,艺术的本质也同时被颠覆。[4]文化原本是抚育心灵的,但文化工业却只满足心灵的虚假需要,对个体进行统治的工具,最终使主体性衰落。

外在支配导致人“逃避自由”、“爱欲降低为性欲”等。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个体化的人脱离了自然、面对孤独,非常希望有所归属,解决这一需求的方法有:放弃个体独立性投身强大的外在力量;通过爱、创造性活动建立起与自然和他人的联系并不损害自己的独立性。后一个方法可遇不可求,所以许多人

逃避自由,愿意放弃自我投身集权的依靠。受虐狂是关于接受集权心理的外化,施虐狂是施加集权心的外化。弗罗姆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人主动放弃自由的缘由。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把对人本能的压抑分为“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人的行为本能地遵循“快乐原则”,为了躲避祸患还得遵循“现实原则”,人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且要受制于社会,因而还得遵循“行为原则”(即特定时代的行为规范),而发达工业社会的“行为原则”对本能的压抑属于“额外压抑”,导致劳动异化为苦役、爱欲降低为性欲。

二、争取主体间性社会环境阶段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末德国在阿登纳的领导下在战争废墟上创造了经济“奇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非理性被现实的变革经济社会的成果遮蔽;法国则经历了1968年5月的群众运动风暴的突然爆发并迅速结束,使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希望通过解放性实践变革无产阶级命运的理想遭受了一次无情的打击。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争取社会的理性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的任务。哈贝马斯与其学生为代表的第二代批判理论家“考察了使理性从一种解放(人的)工具转变为统治(人的)工具的哲学前提。”[11] P298)哈贝马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发展、萎缩的历史梳理,捍卫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合理性;通过对交往行为和主体间性的论述,倡导社会应当拥有开放、平等的话语交流、共同商议公共事务的机制与环境,以构建起民主协商达成的共识指引社会实践的新“合理性”。

捍卫理性运用的空间——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里,哈贝马斯在阐释“公共领域”时是和“私人领域”对应来讲的。他认为,公共领域是指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而大众传媒的功能和问题群居于中心地位,它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普通民众的公共领域”两部分构成。接着,哈贝马斯考察了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兴起、发展和萎缩的历史。哈贝马斯通过理论和实践对照的分析指出,“历史的失误需要用现实的解放实践来加以克服,理性只有在公共使用中才能发挥其历史建构作用和现实批判作用。”[5]对继续保留“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必要性进行了强调。

推崇交往行为、力主体间性。在《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阐述了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发展正是在“目的——功能合理性”扩大中得以实现的,然而结果是“终极价值”引退、意义飘散、人性被压抑、自由堕落。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之所以对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持悲观态度,是因为把“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合理性一般”,而“目的合理性”只从主体——客体的关系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跳出旧的意识哲学的窠臼,哈贝马斯主张把人的精神活动同人的行为、把人的行为同生活世界、把生活世界同系统、把社会和语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寻求更加合理的“合理性”。行为成为创造新的“合理性”的理论起点。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分为四类:目的性行为(又称作工具性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目的性行为以成功为目标取向,以合理规划为特征,植根于支配自然的主体性计划,津津乐道于对自然的统治,针对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规范调节行为对应于社会世界,这个世界从本体论上说虽由行动者个人组成,但规范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戏剧行为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观点和印象的行为,侧重于主观世界对外部世界的适应;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对话行为,而且还是在行为主体共识基础之上,通过规范调节实现个人与社会和谐的行为,交往行为涉及了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因而更具有合理性。交往合理性的特征有:语言性、主体间性、程序性、开放性、暂时性和可误性。交往行为是以“生活世界”为背景的,“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相互理解的基本性、构成性要素。“生活世界”又是和“系统”并存的。“系统”是一种技术性的东西,在其中主要运行着目的性行为,包括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社会就是由“生活世界”和“系统”两部分构成的。影响当代社会“合理性”的核心问题是“经济、行政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使生活世界的结构被破坏,并由此失去人性。哈贝马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勾画出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理想社会是“无限制的交往的共同体”,这种交往社会因成员自主决定生活方式、处理事务程序正义、形式上保有完好的主体间性,以及自由地相互承认的对称关系而值得我们追求。虽然哈贝马斯没有对理想社会详细论述,但是已经体现出他力主通过交往行为在“生活世界”之中、在“系统”中、在“生活世界”和“系统”之间采取主体间性的原则运用语言达成共识、并用共识作为实践的指向标,以构建“合理性”,最终使目的与价值能更好地结合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深深用意。^[6]

三、强调承认“他者”阶段

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体现出扩张性,贫富不均、文化排斥、大量个人和群体被排斥到社会边缘与现代化的新成果无缘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化阶段的种种社会冲突和危机。正视“他者”,伸张社会中受益最少群体权益成为追求社会正

义的重要课题。批判理论的主题随之也从奠定政治经济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转移到了对“他者”权益的捍卫上。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导人霍耐特的代表作《为了承认而斗争》、南茜·弗雷泽的文章《从再分配到承认?》、霍耐特和美国学者弗雷泽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奥尔森主编的《伤害+侮辱》;美国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斯蒂芬·布隆纳的《重申启蒙》、塞拉·本哈比的《他者的权利》等著作多表达了对于他者权利的捍卫。

承认是交往理性的基础。霍耐特借鉴黑格尔的理论:斗争是人类精神伦理发展进程的核心,而不同主体间为了“自我持存”又必然会出现彼此由妥协而来的承认,结果是主体既与他人达成了一致,又在相互承认中进一步发现了自己的独特性和特殊性,进而又会与他人形成对立和冲突,交往行为就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展开,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霍耐特在《为了承认而斗争》一书中将承认和主体间性结合起来,对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赋予了现代的意义。他认为坚持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必然要求行为各方有所妥协、相互承认,交往行为最终才能被完成和延续,而承认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蔑视。他提出了现代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权利和团结。在一个好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从爱和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承认”,从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和同等尊严关系中获得“法律承认”,从群体成员的价值共同体关系中获得“团结承认”。个人从三种承认中形成自信、自尊和自豪。^[7]换言之,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都要依靠交往活动中的相互承认;只有在社会个体间、社会个体与社会团体、社会个体与社会体系间保有承认,社会的正义才有保障。

再分配正义和承认的结合才是对他者的正义。弗雷泽的《从再分配到承认?》针对当代左翼对他者的社会、文化不平等较多关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者所遭受的再分配中的经济不平等,所以,弗雷泽强调变革他者在再分配中不平等地位的重要性。同时,他反对霍耐特把再分配归到承认中,她认为经济公平和文化平等是正义的两个互不可替代的维度,二者无论谁包含谁都会使另一方遭受损失,只有把二者明确区分开来才能使他的经济与文化权利更好地得到维护。一个更为合理的正义构架是建立在再分配正义和承认二者基础上的。

赋权给他者。美国第三代批判理论家斯蒂芬·布隆纳面对当今西方国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仇视外族等等激起了持续不断的种种新社会运动的社会现实,反思引领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启蒙运动,重申启蒙价值,要社会赋予他者以法律规定的权利。在《重申启蒙》一书中,布隆纳指出启蒙运动是一种与压迫性的制度、不公正的特权和不合时宜的文化实践作斗争的运动;他重申了启蒙价值:政治民主,经济公正,社会宽容、理性。布隆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应当重温启蒙运动、启蒙价值,坚持启蒙运动(下转第27页)

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据此,苏联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着这三大问题积极探索,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列宁之后,苏共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或者脱离苏联实际教条主义对待意识形态,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或者借口时代与历史条件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修正主义的态度,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和解构。最终,苏共无法从意识形态那里获取它的执政合法性,被苏联人民抛弃,遭历史淘汰。同样的情况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

从对中国共产党与苏共发展史的比较中,不难发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发展的结果也不同。所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科学的意识形态观本质上又具有一致性,两者统一于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9]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政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建设者,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从时代特征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内容,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必须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科学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在不断发展的时代潮流中创新马克思主义,将民众利益作为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依据。

参考文献:

- [1] 列宁.列宁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
-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659.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 [4] 恩格尔.意识形态与现代政治[M].台北: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6.
- [5]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18;217.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6.
- [8] 张维忠,任会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J].湖湘论坛2011,(4).
- [9]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第1版.

[责任编辑:阳玉平]

(上接第17页)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真正赋权给他者,才能使他者权益受到维护,才能使社会正义实现基础上新社会运动缓和,才能使社会拥有良序。

纵观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担当着现代性的医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牛虻,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批判当代社会现实的不合理,并希望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变革不合理的现实,使社会不断趋向自由、平等、宽容、理性。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努力揭露外在支

配和压迫以培养大众的主体精神形成反抗的声浪、解放的行动;到第二代批判理论家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奠定政治、经济、文化合理性的基础——保有公共领域、遵循主体间性原则以语言为中介展开不同层面的交往商谈行为,以共识作为行动的前提来保障社会的正义;再到第三代批判理论家直接捍卫社会中受到歧视、压迫的少数群体的利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坚持以人、以人的权益作为理论的目的,以社会的正义为理论追求的目标,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做出了重大的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1]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2] 霍克海默,曹卫东.霍克海默集——文明批判[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2).174-175.
- [3]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4] 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 [5] 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导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6] 艾四林.哈贝马斯交往理论评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
- [7] 周德明.N.弗雷泽和A.霍耐特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J].世界哲学,2009,(2).

[责任编辑:蒋民胜]